



【人生履痕】

我的自行车生涯

文 王平华

上海人称自行车叫“脚踏车”，我八岁学会了骑自行车。60年前，叔叔在上海工作，我们一家被下放到老家宝山农村。叔叔经常利用休息日，要到乡下来探望父母亲，即我的祖父母。从市区到乡下来回70多公里路，乘车车费约要1元多，为了节省这1元多钱，叔叔必须每次骑自行车来看望父母亲。

有一次，叔叔早晨从市区到乡下时，天气晴朗，下午要回市区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为了安全，叔叔把自行车放在了我家，他只能打伞乘车回市区。自行车在我家，我放学回来，做好功课，这自行车就是我的玩伴了，我天天推着自行车去踏车。那时我人小个子矮，刚开始只能一只脚踏自行车踏板，一只脚在地上蹬，车有了动力，人站在自行车上滑行。时间一长，掌握了自行车的性能，便跨在自行车三角架上骑。二八大杠的自行车，上下车有难度，我经常摔得鼻青脸肿。我这种右脚伸进三角架踏上另一只脚踏的骑法叫踏“S”

车，因为，人体扭曲成S型。我是宅上会骑自行车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只要放了学，打谷场上就有我蹬着“S”车的身影。

不久，叔的自行车骑回上海了，我只能看着小伙伴们骑车了，因我家买不起自行车。几年后，“文革”爆发，我小学毕业，没书读了，只能去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经过一年的艰苦劳作，我挣了300多个工分，每个工分5角，年终分红时，扣除粮草款，全家3个劳动力分得了300多元人民币。我和父母商量，能否帮我买辆自行车，可苦于拿不到自行车购买券，生产队一年计划分配到的自行车购买券也就两张，绝对轮不到我这个“半劳力”。家人商量决定请车行里师傅拼装一辆重磅型的自行车，车架用自来水管焊接而成的，后面书包架用16毫米粗的钢筋焊接制成，整车170元，化掉了全家半年多的心血钱。在那时有这样一辆自行车，等于象现在家买了辆重型卡车，生产队的伙伴们也很羡慕，围着观赏这辆无牌土造自行车。这一年我15岁。

家里有了这样一辆自行车，就能多挣工

分。那年代生产队交公粮、卖棉花、进牲畜饲料等运输，量大用水泥船载，量小只能用自行车。我的自行车是生产队里最能载重的车子，车上能驮二、三百斤重物。有时购饲料要踏四百多斤，从市区到宝山，一口气骑两个多小时回家，为此我凭这辆自行车比同伴们多挣了许多工分和补贴。

姐姐回娘家，让我去接，一车连我载了四人回家。生产队里有人生病送医院，他们躺在放在板车上的躺椅上，我用自行车牵引他们回来，这辆自行车是那年代村里重要的运输工具。

我后来进了工程建筑公司，领导觉得我骑这辆无牌超重自行车没派头，主动给了我一张自行车购买券，我去买了辆凤凰牌18型28英寸自行车，铮亮的镀铬钢圈钢丝，在阳光照射下，会发出一闪闪耀眼的光亮。骑着这辆自行车驰骋在马路路上，比现在开奔驰还要拉风。

说着，半个世纪过去了。我现在出行经常开私家车，但我会骑自行车去买菜或近距离办事，空闲时，我还会骑上奇安特牌变速运动自行车去锻炼身体。

踏上自行车那一刻，我的思绪便会穿越时空，把过往和现实串连起来，我的心里就觉得特别踏实。

【百姓论坛】

由篾匠想起的

文 陈日旭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就读的那所小学边上有一家竹器店，上学路过此地常要跨过几根横亘于人行道上的毛竹，放慢步履。于是，不免转头朝店里张望，两位师傅正用刀具割竹子，粗的一端搁在垫着围裙的腿上，尾梢一头就伸到店外了。

那时，我正在学吹笛子。如遇竹子刚好劈成两半，竹肚内露出油光的竹膜，我会迅即蹲下身子，细心地整张揭下，夹藏于书内，留作当笛膜用。竹子长，有时还不免跨进店内去找，就怯生生地唤一声“老伯伯”，只要不碍手脚，他们也就眼开眼闭了。此时，我除了瞧见墙上挂着的竹匾、竹篮、淘米箩及小竹椅等物件，更多瞥见的是师傅们那专心致志的神情，一双双青筋凸凸、满是老茧的大手。

听大人说，篾匠最大的本事是批篾青，那精致的细条篾青可以编制多种上等器物。彼时还是孩童的我尚不知何谓“匠人”？随着岁月的推进，耳廓里开始“灌”入与“匠”连贯的名词：用砖砌墙、上房盖瓦的，叫“泥瓦匠”（上海人俗称“泥水匠”）；与各色木材打交道、专管木工活的，叫“木匠”；修补、制作鞋子的，叫“皮匠”；专门替人量体裁衣定制服装的，可称“缝衣匠”（上海人俗称“裁缝”）；制作木桶、木盆的，叫“箍桶匠”；能敲打白铁皮，做出畚箕、铅桶的，叫“铅皮匠”（规范称呼为“钣金工”）；“叮叮当当”锤打烧红铁块的锻工，人称“铁匠”；机械厂里会制模具，车钳刨铣几乎样样皆能的钳工，被尊称为“外国铜匠”；连教书育人的老师，也会自谦：在下乃“教书匠”也！更有著作等身、文学艺术造诣深广的“文学巨匠”等。连同篇头所述的“篾匠”，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冠名：“匠”。

匠者，亦称匠人，有专门技艺，且精益求精者也。时下，但凡冠有“手工制作”必定身价飙升。大到红木家具，小到网红青团，更有文化创意饰品之类的手工艺品，受到市场追捧。应了一句：物以稀为贵。大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东西自然不稀罕，小批量个性化的手工艺品，怎不令人喜爱？一度轻视手工匠人的社会现象，正被弘扬“工匠精神”，崇尚劳动的正能量所取代。

笔者由“篾匠”生发出如下联想：其一、倡导新的工匠概念，不是纯手工的简单回归，更不是落后的作坊式劳动，而是应当在注入高科技的工业化大生产中，秉承工匠精神，对产品不断精益求精。瑞士机械表生产堪称新工匠概念的最佳诠释。

其二，强调培植“独具匠心”意识。所谓独具匠心，用时髦话说，应该具有创新意识。就拿裁缝说，量体裁衣似乎亘古不变，然而，当下已经可以不用人工量体了，计算机三维技术的运用，比手工量体精准得多。但手工裁缝讲究缝纫针脚精细的工艺及追求品质的精神是不可丢失的，也就是“匠心所在”。

其三，创造条件提高匠人的社会地位。一个时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只推崇本科、硕士、博士之学历，对于劳动技能不屑一顾，更不知“八级钳工”对于制造业是何等稀缺的人才。这就难怪技校、职校的学生自觉脸上无光，在那里任教的教师也似乎矮人一头。好在这一不正常现象正在扭转，笔者赞成建立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与学历学位具有同等价值，这对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当今社会何止三百六十行，不管哪一行，行行需要工匠精神。再细一想，工匠之心，其实不就是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不断创新之心吗？时代呼唤匠心，社会滋养匠心，让匠心根植于国人之心！

【时令物语】

想起儿时学包粽

文 杨月琴

芒种一过，端午节也该来了，到农贸市场去走走，你会发现，小贩们已经开始叫卖一筐筐散发着自然清香的粽叶了。虽说现时的粽子早已成为四季食品，但平时吃总觉得不时令，不喜庆，唯端午节吃粽子、赛龙舟，才适逢其时，欣欣有喜。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节，粮店里计划供应糯米赤豆，菜场里凭副食品卡买粽叶，药房里有蒲剑、艾蒿、菖术、白芷，小贩们穿街走巷兜售香囊。《本草纲目》中对“端午”有如此记载：“今俗五月五日以为节物（指粽子）相馈赠，或言为祭屈原，作此投江以饲蛟龙也。”“挂蒲剑、插艾蒿，炷菖术、曝白芷，烟熏居室，驱瘴避秽，洒扫庭除，清清爽爽。”故端午节包粽子，掸灰尘迎接夏季，成为中城弄堂一景。

我小时候，家里不买粽叶。节前，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到浦东川沙外婆家去摘芦叶。那时农村自然环境好，池塘边、河浜旁芦苇长得丰茂旺盛，其叶菁菁。我们拿着剪刀“喀嚓喀嚓”剪芦叶，一会儿就篮满筐满。采摘完芦叶，我们并不急于回家，在河漫滩，母亲教我们包沙泥粽子。这可是个技术活，紧不行，松不行，既不能让芦叶散开，又要防止泥沙漏出，拿捏都在感觉之中。初包时，我们常常顾此失彼，不是粽叶相离，就是泥沙俱下，即使偶尔包好一只，模样也是惨不忍睹，粽子瘪瘪的，粽叶疏散的，形状七歪八扭。母亲说，她的本事也是在这河滩边学会的。

母亲绝对是包粽子的一把好手，十几斤糯米的粽子半响就包好了，而且品种多样，有肉粽、赤豆粽、豆沙粽、红枣粽、豆瓣粽、甚至白米粽；形状各异，有菱角粽、三角粽、枕头粽、小脚粽等。她包的粽子只只松紧适度。之

所以到外婆家去包粽子，不仅仅是因为可以不用买粽叶，更主要的是外婆处包粽子的原料多，积存的糯米、赤豆、红枣等原比市区计划供应的多。母亲还喜欢乡里包粽子时的那种氛围：宅上家家灶火旺旺，炊烟袅袅，男人们怀揣着雄黄酒，蹲在灶坑里埋头烧火，时不时啜一口；主妇们在案板边包粽子边聊天；孩子们吹着用芦叶做的哨子，脑门上涂着用雄黄酒写的“王”字，满世界乱跑，一幅端午吉庆图。锅盖一开，满屋飘香，甚至整个宅上都弥漫着浓郁的粽子清香。粽子一熟，邻里间相互赠送，互通有无，暗地里还较劲着比手艺，真是其乐融融。

前些年，亚洲某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端午节为他们国家的文化遗产，而且申办成功，不知是真是假。中国人想要划龙舟、吃粽子、过端午，需向他们提出申请，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我想，不管谁向谁申请，元宵观灯、清明踏青、端午吃粽、中秋赏月、重阳登高、腊八喝粥、冬令进补、春节过大年，这些传统节日和四时节，首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其次才是世界的。

【想到就说】

说起“身份性质”好感慨

文 道林

某日，打开群里转发的一个帖子，题为“Jezz酒吧创始人林栋甫……”，读到艺术多面手林栋甫初出茅庐时，上海译制片厂招生组看中了这个声音浑厚的年轻人，却因身在某区房修队的小林同志的身份性质是“集体所有制”，无法调入“全民所有制”的译制片厂。他的恩师邱岳峰爱莫能助……读到此处，拨动笔者心弦，记忆闸门被冲开。

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有两大所有制，一为“全民所有制”；二为“集体所有制”，“全民”自然高于“集体”。干部与工人有身份性质的区别：同是干部，全民干部比集体干部高出一头。集体所有制内还分出“大集体”和“小集体”的性质不同。在这一制度藩篱下，一般人想改变自己的“身份性质”，很难。一个集体企业职工想调入全民企业，没有招工指标，只能算借调，到月头领薪水和全民身份的职工不在“一张表”上。林栋甫当年就遇上了这道“坎”。那年月工人进机关当干部，纯属凤毛麟角。通常情况下，集体职工想进全民单位，难；全民职工要进机关，也难；集体职工要成

为国家干部，难上加难。

笔者有过这“难上加难”的切身体会。当年，还是知青的我被抽调进县剧团工作。进团后填写的“职工登记表”中有一栏“企业性质”，团领导告知填“集体”。当时有点懵，老前辈告知，解放后戏班改建为剧团时填的是全民事业单位的“干部登记表”。1960年，动员机关干部下放，县里为了完成“下放指标”，将该剧团45名演职员列入下放名额，县机关党政干部就不用下放了。剧团从事业单位降格为大集体企业。当年的老艺人压根不知身份性质有多重要，还以为“当干部是唱戏，当工人也是唱戏。”

让笔者知道这利害关系的是一次工作调动。1981年，滁县地区文工团（今滁州市歌舞团）调我去该团工作。团长跟我说：“小道，因为身份性质不同，你的档案关系暂时先放在地区文化系统的劳服公司，等转干指标来了，我就给你转身份，你得有耐心喔！”

按照先来后到的惯例，我当时是排在等候指标的第三位。第二年来了一个指标，排在第一位的解决了。第三年，局里没分指标下来，熬到第四年又来一个指标，该轮到我了。

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指标给了一个刚退伍的某县供电局架线班的电工（借来搞舞美灯光），让我等排队等指标的演员们傻了眼。一打听，此人是关系户。我咽不下这口气，层层上访，把诉状递到了分管宣传文化的地委副书记手里。状，告赢了，那个电工灰溜溜地回原单位去了。利，我没得到，指标最后给了一个来应聘声乐演员的待业女青年。

我得罪了领导，转干无望，另谋他途。第一步我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获取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大专学历。第二步，参加了1991年安徽省第一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考试。我成为所在凤阳县2名“五大生”（电大、职大、函大、夜大和自考毕业生）招干指标中的一名。参加的考生多达360多人，而分配指标仅2名，录取比例为0.56%。揭榜后不久，我填写了中组部统一印制的“干部履历表”，成为一名国家干部（当时不称公务员）。

高兴劲很快过去。因为，我还在大集体性质的轧花厂上班，别说适合我擅长的宣传文化部门进不去，就连主管部门县供销社也进不去。

最终让我进入机关工作，是人事制度改革后的1996年。那年，我通过人才招聘回到了家乡上海。先是在新泾镇政府机关工作，后调入长宁区政府办公室工作直至退休。